

从行为主体的成本与收益角度看“诚信”问题

张德寿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 云南 昆明 650111)

摘 要: 关于诚信的话题已经够多的了, 没有人会否定诚信之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仅从道德愿望出发, 期望人人都讲诚信, 试图以道德教化的手段实现诚信之风的养成, 那绝对是玩不转的。可否换个角度思考: 人为什么一定要讲诚信呢? 其不讲诚信又怎么样呢? 诚信与否和人的行为成本与收益有没有关系呢? 毫无疑问, 这种关系不仅存在, 而且很密切。此以为, 诚信与否, 关键是行为成本与收益的问题。

关键词: 诚信; 不诚信; 成本与收益; 治理

中图分类号: D631.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681(2004)06-0082-02

作者简介: 云南行政学院语文教研部副教授。

不管诚信还是不诚信, 在社会关系里, 一定会产生某种结果。诚信与否对当事者产生的结果概括起来, 无非有这么几个方面:

其一, 讲诚信, 诚信者得到肯定与回报。这种肯定与回报可能是精神性的, 比方说得到他人或者社会赞美赞赏; 也可能是物质性的, 比方说得到实际的利益; 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既包括精神方面的, 又包括物质方面的。

其二, 讲诚信, 并未得到精神的肯定与回报, 也没有得到物质性的肯定与回报, 在社会生活中, 诚信变成理所当然, 仿佛穿衣吃饭那样平常。

其三, 讲诚信, 诚信者非但得不到肯定和回报, 反而受到了损害。比如说精神上受到打击, 最典型的莫过于被当成大傻瓜; 比如说物质上受损, 钱财被骗落空等等。

显然, 诚信者遭遇的上述三种结果是从概率角度而言的。实际诚信最可能产生的后果是上述的其一和其三种。第二种过于理想, 过去没有, 现在没有, 将来也难说会有。同样, 不诚信, 从概率角度看也将产生三种结果:

其一, 不讲诚信, 得到肯定与回报。这种肯定与回报也包括精神和物质性两个方面。比方说出尔反尔, 口是心非, 阳奉阴违等等, 被认为是头脑灵活好用, 办事能力高超, 甚至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如此, 不诚信不但没有失信之责, 奸诈之过,

反让其产生英雄之辈的自满自得。这算精神上的肯定和回报。而物质上的, 因为不讲诚信, 却换得提前小康, 甚至财源滚滚, 爆富流油。这样, 不诚信变成了致富的捷径, 在一种扭曲的环境里, 成了让人羡慕的好手法。

其二, 不讲诚信, 既无精神上的回报, 也无物质上的收益。在自己, 不过习以为常, 无关痛痒; 在他人, 已成见多不怪了。

其三, 不讲诚信, 受到惩罚, 被人鄙视, 人格破产; 或失钱失物, 利益大损, 等等。

显然, 不诚信的结果, 在社会中最可能发生的也是第一和第三种。第二种过于极端, 对某个个体是可能的, 对整个社会群体不太可能。

根据上述情况,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诚信与否的结果对诚信者, 或者对不诚信者是有利还是不利, 或者说其所付出的成本或者所得收益状况如何, 是促使人追求诚信还是背弃诚信的关键。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就可清楚, 如果一个社会要养成诚信之风气, 减少不诚信的现象, 其着力点应该放在什么问题。显然, 着力点应该放在对诚信和不诚信结果的处置上。

诚信, 通常是作为道德的问题。无疑, 诚信不是天生的, 一定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反之亦然。人一定要讲诚信, 背后一定存在着这样的逻辑: 诚信可以给其带来精神或物质的肯定与回报。这种肯定

和回报套用经济学的话就是收益。换句话说，人如果不得不讲诚信，是因为不诚信会让其造成损失。这种损失就是不诚信的成本支出。当诚信变成一种自觉的道德规则，进而成为一种习惯，这种肯定和回报或者说收益从广义上说包括了自我道德感的满足，包括了自我避免了因为失信而产生的内心自责和愧疚。但请注意，其前提是诚信已成为了自觉的道德原则。所以诚信行为，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自觉的诚信，二是不得不诚信。同理，不讲诚信，在社会生活中，也存在两种情况：要么是被迫的，不得不做出不讲诚信的举动；要么是主动的，也就是说故意地不诚信。因为不讲诚信，反而得到丰厚的收益。在此情况下，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种种不诚信行为的产生，已不可简单归到人性善恶的问题了，甚至不能简单地归到人的道德高下的问题了。问题不在这种行为本身，而在导致这种行为的社会环境上。为此，要治理不诚信，宏扬诚信，着力点应该放在对诚信和不诚信结果的处置上：

一是使诚信者得到肯定和回报。从社会精神的角度，我们的社会应着力构筑这样的环境，给予诚信者的诚信行为以赞美赞赏。与此相应，给予不诚信者，不诚信的行为严厉的批评与指责，构成反对不诚信的强大社会压力。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对出于利益追求不讲诚信的行为重惩。有了这样的环境，长期以往，诚信就有希望内化与人心，在社会群体里，因之互相影响，彼此互动，逐渐养成诚信之风。另外，如果关涉物质，或者有必要用物质手段，则应该有强有力的社会机制使讲诚信者得到应有的回报，至少不因为诚信而利益受损。有了这样的基础，从求利的愿望出发，为了更好地实现利益，人才会自动权衡利弊，产生对诚信的自觉。反过来，如果不讲诚信，不但没有精神的回报或物质的回报，还遭到冷漠，甚至被当成大傻瓜，特别是利益受到损害，这势必强化不诚信意识。久而久之，将引起恶性循环。可以这么说，但凡一个社会声嘶力竭呼唤诚信，一定是在这个社会诚信变成了稀缺资源。但是，光呼唤是唤不来的。

二是使不诚信者遭受惩罚。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成为核心问题。经济活动中的不诚信，目的就是为了利益。既然不诚信是为了利益，那么惩治就必须以利益为核心展开。就说假冒伪劣、欺诈等等，问题的关键不是当事者不明白这样做是不对的。但凡一个公司、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可以屡屡不讲诚信，一定是其如此所为了不失去什么，或者失去很少。这是其一。其二，是其所作所为或者利益照保，或者能得到巨大的利益回报。可以肯定地说，今天的社会活动中只要是与利益挨边的种种不诚信，根本原因在于后者。这暴露出什么问题呢？起码暴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的社会对不诚信的防范机制不健全；二是对出于利益获得的种种不诚信行为的惩治太轻，不足以产生震慑作用。换句话说，就是不诚信的成本太低。试想，如果不诚信的行为受到严惩，不仅为此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而且由于信用

的散失而影响到其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谁还会在动心于不诚信之时不掂量掂量成本与代价？

不诚信固然与社会转型时期短期经济行为有关。但说到底，之所以短期行为猖狂，根子还是在于不诚信可以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的可能性比付出的代价可能性要小得多。如此，诚信与不诚信，在高涨的商品经济时代，关键是成本与收益的问题。从社会管理的层面看，这是一个管理问题。如果诚信收益大于成本，那么，诚信至少不会出大问题。反之，如果不讲诚信，效益大于成本，那么，不诚信就绝对有生存的土壤，泛滥是自然而然的事。

无疑，治理不诚信，我们应重视诚信教育。但是，在不诚信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一般的教育往往苍白无力。我们老祖宗关于诚信教化的理论不谓不精，所下的工夫也不谓不大，但为商不讲信用，为商奸诈的情况不见得就减少了。进而言之，帝王伪善，官吏失信，政治无常也没有减少过。当然，重惩也可算是一种教育。如果要通过教育教化来减少不诚信，必须包括严惩这种教育，而且应放在首位。诚信不是天然的，从发生学角度说，一定与惩罚有密切的关系。人并没有带着与生俱来的诚信基因。至于成为一种文化，一种道德自觉，那是经过漫长的社会磨合与陶冶而成的。邓小平说过，要用制度管人。说到底，诚信的建设，还是要靠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其逻辑起点应首先是使人不敢不讲诚信，不得不诚信。然后，才是教育教化的问题，不能把主次颠倒了。

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市场经济在孕育着追求诚信的因素。很简单，社会信用度底，交易成本很高。社会普遍的不诚信，交易很难甚至无法开展。如果还能开展下去，那比赛的就是谁不诚信的招术高了。如此下去，市场经济就将被瓦解。因此，为了维持交易的正常进行，市场经济会“自动”地作出矫正。但是，这只是一种理论的预期。市场经济孕育的诚信养成的积极因素要发扬光大，终究还是要通过社会卓有成效的管理来实现。现在我们必须正视的是，现实中存在交易信息不对称，保护正当交易利益实现的社会机制不够健全，以及一些交易中腐败权力的左右等等因素。不治理这些问题，诚信之风不会自动产生。

自然，诚信之风的养成，需要从诸多方面入手。我们也不能对重惩效果过于乐观。在利益为轴心的时代，利益的诱惑在某些人那里是会压倒对惩罚的恐惧的，侥幸心理的存在在所难免。总有这种感觉，要把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种道义的诉求变成完完全全的现实，一直以来都在挑战着人类的理性、人类管理的制度设计能力。我们所能做的恐怕只能是将不诚信现象尽量减少。

顺便提一点，这里强调诚信行为与主体成本收益的关系，并不否认存在不计得失，甚至牺牲自己而践履诚信的高尚之举。但我们也不能天真地相信，这种高尚之举在经济领域，甚至更广大的领域会成为人人奉为圭臬东西。

(责任编辑 闻 道)